

托马斯·珀西的中国研究刍议

——以《中国诗文杂著》为中心¹

李 真

一、引言

英国早期的汉学研究较同时代欧洲大陆的法、意、德等西方诸国为迟。在 16-17 世纪，中英之间尚未有直接联系，英国只能通过翻译欧洲其他语言的汉学著作，借助于从邻国辗转获得的材料与信息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直到 18 世纪晚期，英国本土才开始有了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萌动，推动了汉学研究的进展。其间，有一位“准汉学家”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81）值得学界关注。托马斯·珀西是 18 世纪英国的著名诗人、收藏家、德罗莫尔主教。1761 年，珀西编译的《好逑传》英译本，由伦敦多利兹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小说第一次直接译介到英国和欧洲。《好逑传》直接由汉语译成英文，不再借助其他的中介语，从本质上而言，是一部真正的译著。该书后来有了从英译本转译的欧洲其他语种译本，标志着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的成就。

目前，在有关珀西的研究中大多都以《好逑传》英译为主题，对另外的汉学作品还未能全面展开研讨。陈受颐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他 1928 年的博士论文《十八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后期发表的《〈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从中英文化交流史角度介绍了珀西的译本。此外，关于英国汉学的专著或论文也多关注《好逑传》，如熊文华《英国汉学史》有一小节讨论《珀西与好逑传》，简单介绍了珀西的生平，及翻译的《好逑传》的主要内容；其他作品一笔带过。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从翻译史和传播史角度出发撰写了多篇论文谈及《好逑传》英译，探讨中国古典小说外译的特点仍是主要的研究范式。

除了众所周知的《好逑传》英译本，珀西在 1762 年还专门编译了一本《中国诗文杂著》（*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这是当时英国本土首个汇编了德、英、法不同作者关于中国认识的合集，主题涵盖语言、道德、戏剧、园艺、天主教在华发展史等内容。这些论文或译文对于了解 18 世纪英国汉学发轫期具有重要的价值，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仍不多见。本文将以此书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以此个案为原点所折射出的 18 世纪英国早期汉学研究及其特点做一分析。

二、珀西及其文学成就

托马斯·珀西（1729-1811），德罗莫尔主教。他出生在英国的布里奇诺斯（Bridgnorth），父亲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托马斯·珀西《中国诗文杂著》研究”结项成果。

是一个杂货店老板和农场主。珀西 1750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Christ Church), 1753 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 他被任命为北安普顿郡 (Northamptonshire) 的一个小村庄伊斯顿莫得维 (Easton Maudit) 的牧师。1756-1782 年期间, 担任了维尔拜 (Wilby) 的教区牧师。1769 年, 珀西被任命为国王礼拜堂牧师, 同时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 (Emmanuel College) 接收他入学, 1770 年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在珀西的圣职授予人北安普顿郡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影响下, 1778 年, 珀西成为卡莱尔大教堂 (Carlisle Cathedral) 的副主教; 1782 年被任命为德罗莫尔主教。1811 年去世。

1761 年 11 月 14 日, 珀西编译的英译本《好逑传》(四卷) 在伦敦问世, 1774 年再版。该书有三个附录, 最后一个附录为: 《中国诗选》, 里面共有 20 首诗, 大部分是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里转译过来的, 其中有《诗经》的《桃夭》《淇奥》《节南山》等篇目。1762 年, 他又出版了一本中国散文及译文合集 (大多为译作), 名为《中国诗文杂著》(又被译为《中国杂记》或《中国札记》)。除了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品之外, 珀西潜心研究早期英语, 1765 年出版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集《英诗辑古》(*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该诗集收录了 176 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谣, 包括自 14 世纪至 18 世纪的一些十四行诗、政治抒情诗、传奇诗等。这些诗歌是 18 世纪民谣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品, 因此这个集子也可看成是一部早期的英国文学史。该书的出版使读者对古老的中世纪文学和早期文学形式产生浓厚兴趣, 同时, 对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也产生了影响。

三、托马斯·珀西的中国研究

珀西自己不通汉语, 但并不妨碍他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兴趣。从《好逑传》的前言中得知, 他在 1758 年 2 月从一位叫威尔金森的船长那里得到过一部中国小说的英文翻译手稿, 这部小说就是《好逑传》。据称该船长的叔叔詹姆斯·威尔金森 (James Wilkinson) 曾在广东经商, 学习过汉语, 这部 17 世纪中国流行的通俗小说是其学汉语的翻译练习。珀西得到这部手稿后, 进一步对译稿进行了润色和加工, 增加了前言与相当多的注释, 还增加了一些附录, 包括《中国戏剧中的争辩与叙述》《中国谚语选辑》和《中国诗选》。1761 年, 由伦敦著名的书商罗伯特·多兹利出版, 英文书名为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 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 曾被列为“第二才子书”。该书深受西方人青睐, 外文译本和改编版达十二种之多。在珀西的译本出版后, 1766 年有了法文译本, 德文译本, 1767 年又出版了荷兰文译本, 在欧洲引起了不少反响。

范存忠先生在《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中曾经点评过珀西的译文, 认为由于珀西汉语程度极其有限, 译本在中文原本句读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翻译中有误译、删削, 甚至不合理地重新排比章节而造成情节混乱等不足; 同时也肯定了珀西利用二手资料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序言、索引和大量文化类注释的作法。珀西在序言曾说, 自己在编译《好逑传》的过程中收集了二十五六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材料, 方便对小说内容和情节中所涉及到的中国思想与风俗加以解释说明, 其目的是让英国读者通过阅读中国人自己创作的小说来了解该民族的风土人情。在该书的

扉页上，珀西引用了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上的一句话：“如果要了解中国，那么除了通过中国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这样做，在认识该国的精神和各种习俗时肯定不致失误。”书中对中国的瓷器、陶器、宝塔、人参、茶、酒、药草、孔子、宗教和道德、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妇女和家庭生活等，都详细地进行了注释说明并标明了出处。同时，小说本身和注释部分也都编制了索引。在珀西之前，还没有哪位作家对一部有关东方和中国的小说进行了如此细致的注解，在18世纪英国出版的小说中也只有《好逑传》编了如此详尽的索引。²《好逑传》是英译的第一个中国长篇小说，打破了英国之前只从欧洲其他语言转译有关中国书籍的惯例，此后欧洲国家也开始从英语转译中国作品了。³

珀西在1762年还专门编译了一本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中国诗文杂著》)，上下两卷，共482页之多。珀氏不通汉语，他的著作编纂完全是通过对二手资料的了解和研究而完成的，大部分材料来自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诗文杂著》的影响不及《好逑传》的英译，但也显示了珀西对中国的持续兴趣。书的封面在标题下面刻有四个汉字“物格知至”，标注了注音“ve, ki, chi, chi”和对这句话的解释，并标明是孔子的话。第二页是一个表格，里面列出了18个汉字，前面13个汉字⁴是在第一篇有关中国语言的文章注释中涉及的，珀西说这是德国学者巴耶尔(T.S. Bayer)在《中国博览》一书为好奇的读者们所提供的中国文字的样子。后面四个是介绍中国的反切发音法举例涉及的汉字。

珀西《中国诗文杂著》附录汉字表⁵

单	(a)	山	9. Xan	言	1. Yen
	TAN	仙	10. Cyen	記	2. Ki
大	(D) Ta	嵩	11. Chuen	語	3. Yu
男	Nan			訕	4. Xan
切	Gie	舌	12. Xe	誹	5. Fi
音	Yn	百	13. Pe	信	6. Sin
		舌	Xe	諺	7. Xe
				訶	8. Ho

书中收录了八篇论文，第一卷有四篇：《论中国语言文字》(*A Dissertation on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一位中国作家写的道德箴言》(*Rules of Conduct by a Chinese Author*)⁶、

²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75-176页。

³叶向阳：《英国17、18世纪旅华游记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⁴表格中“舌”字实际出现了两次。

⁵此表为笔者据原书表格摹写。

⁶该文译自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P. Parrenin)。

《一部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House of Chao: A Chinese Tragedy*)⁷、《赫德先生〈论诗歌的摹仿〉中论中国戏剧》(*On the Chinese Drama from Mr. Hurd's Discourse on Poetical Imitation*)。第二卷也有四篇：《译自莫什因主教德文版〈中国基督教会实录〉》(*Authentic Memoi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from the German of J.L. de. Mosheim*)、《建筑师钱伯斯先生撰写的中国的园林艺术》(*Of the Art of 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 by Mr. Chambers, architect.*)、《法国耶稣会士王致诚撰写的北京周边皇家花园与山庄简述》(*A Description of the Emperor's Gardens and Pleasure-houses near Pe-king, from the French of Frere Attiret.*)、《北京庆祝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观礼》(*a Description of the Solemnities Observed at Pe-king when the Emperor's Mother Entered on the Sixtieth Year of Her Age*)⁸。

珀西在《中国诗文杂著》的前言部分写道“中国人在许多方面判断力和审美力被认为是低下的，在园林艺术和关于道德、真理的认知方面尚值得尊敬。这些篇章将让读者在以上两个方面自己作出判断。”⁹ 这表明珀西对待中国文化并不是站在通常一个仰慕者的角度，而似乎更愿意将自己视作客观的评论家，自认为能够冷静地评论中国文化的声望。

这八篇论文中，只有第一篇《论中国语言文字》是珀西自己撰写的，其余七篇都是均为其他人现有作品的重印或重译。珀西把《论中国语言文字》放在第一篇的位置，可以说也是文集中最为醒目的一篇。文章开篇介绍了中国的官话，称其为中国境内在朝廷和官员之间通行的语言。同时提到官话也是北方省份普通百姓使用的母语；南方诸省则使用当地方言。文中的重点在于论述汉字。珀西说汉字像埃及楔形文字一样，属于象形文字。随着人类智力的提升，象形文字也经历了一个从单纯以图画代表文字到用抽象符号表意的发展过程。珀西认为，埃及人富有创造力，因此楔形文字已经发展到了抽象符号的阶段；中国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还保留有原来古代写法的痕迹。这一点，在表示“太阳”和“月亮”的字符中展露无遗：太阳和月亮起初在汉字中是仿照自然的事物，☉代表太阳，☾代表月亮，而按照现在中国人横平竖直的书写方法，则分别是和。¹⁰ 在珀西看来，中国口语与书面语完全脱节。汉语口语原始粗俗，全无教养；书面语已经进行了一番改良，汉字就是为阅读而创制的，与口语毫无联系。

可见，珀西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态度有一定的负面性，甚至带有一种天然的蔑视。他认为“象形文字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像字母表，所有的词汇都能用这些发音简单的字母表示”¹¹。语言原本是十分质朴又极其简练的，而掌握这套费时的中国文字系统，用珀西的话来说，中国人要用大段时间——“人生中最好的、最充满活力的时光”——去学习读写。他着力强调汉字书写的根本缺点：“汉字书写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很难迅速掌握，要在这复杂的书写体系中登峰造极，需

⁷该文译自《中华帝国全志》中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法文译本。

⁸该文译自法国耶稣会士李明。

⁹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A3,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¹⁰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9.

¹¹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14.

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到他们真正掌握了，也没时间没能力去进一步提升造诣了。”¹² 珀西认定中国各门学科发展缓慢也归咎于此。掌握、传承数量高达八万的汉字严重阻碍了中国书写方式的发展，并且造成中国人习读汉字费时费力，进而影响到对其他学问的探索和钻研。珀西不仅坚持认为汉字的书写体系明显比欧洲字母文字的低下，而且还借此延伸到论证中国文化的低级，“欧洲的科学相较于中国更为发达，这一点传教士已经令中国人心悦诚服：但并未能让他们意识到，这种差异是书写方式的本质不同导致的：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也要让他们明白，除了采用欧洲字母和欧洲语言，若想自助别无他法。”¹³ 珀西进一步借用了杜赫德介绍过的欧洲在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嘴部构造与欧洲人的不同，他们牙齿摆放的方式与我们的不同：上排牙齿十分显眼，有时落在下嘴唇上，至少也会落在下齿龈上，而下排牙齿则向内收；上下齿龈则与欧洲人类似很少碰触”。¹⁴ 珀西抓住这一点，并模仿中国人某些英文单词的发音，以其一贯的嘲讽方式为读者增添阅读的娱乐性：“你们一定很想知道，当中国人念（这些地名）的时候，它们听起来多么奇怪。Europa（欧洲）变成了 Yeu-lo-pa, Asia（亚洲）念成了 Ya-sy-ya, Africa（非洲）读成了 Ly-vi-ya, 而 America（美洲）读成了 Ya-me-li-kya。”¹⁵

珀西一方面反复阐述中国语言与欧洲字母语言相比的那种天然劣势，但又不得不承认与当时已经难以解读的埃及文字相比，汉字似乎不会有失传的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埃及文字始终仅为一小部分人所掌握，普通民众并没有断文识字的机会；而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汉字，并通过大量的典籍、字典、文学作品等将其不断传承下去。“汉字延续数千年，历经朝代变迁、外敌征伐：蛮族入侵者对其视而不见，国内暴政者将其百般禁绝，却仍能存活至今，而且很可能永久存续”。¹⁶ 他甚至做出了这样推断，中国文明已经延续了四千年，只要中国文明没有灭亡，汉字也将随之存在。

尽管珀西在谈及中国语言文字时鲜有正面评价，但他对中国社会重视知识的传统，以及科举选士制度却表达了赞叹之情。据他所知，中国的文人如同贵族一样受人尊敬，无论出身多么鄙陋，也可以凭借学识平步青云身居要职；一旦文人子弟忽略了去培养父辈们赖以显达的学识，那么很快就会家境败落，籍籍无名。他说知识和学问在中国是如此尊荣，所获得的回报又如此丰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社会最底层也能登堂入室，世袭权贵则少之又少。中国的政府雇员都是凭文学才能选拔，而这些职务往往为普通人所得。”¹⁷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珀西内心对欧洲世袭贵族把持政权，而真正有才能的平民却难以施展抱负的不满。

珀西的第二篇译文是译自《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写给杜赫德的一封信

¹²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13.

¹³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15.

¹⁴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22.

¹⁵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25.

¹⁶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17.

¹⁷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Vol. I,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p.20.

信，信中翻译了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用满语所撰写的一部规范国人行为道德的小册子。第三篇文章所翻译的《赵氏孤儿》是继瓦兹版和卡夫版之后的第三个英译本，都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发表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法文译本转译而来。珀西的译本实际是卡夫译本的润色本。第四篇是赫德先生的论中国戏剧一文，评论家赫德在 1751 年把关于《赵氏孤儿》的一篇评论插入到《论诗歌的模仿》一文中，认为《赵氏孤儿》的故事跟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厄勒克特拉》为家族复仇的主题很相似。文中充满对《赵氏孤儿》热情洋溢的评论，但珀西认为赫德对中国戏剧过誉了。第五篇译文是珀西转译自莫什因德文本的中国基督教会情况汇总，该文又从拉丁文本转译而来。尽管珀西看轻中国的文学艺术，对中式园林却抱有好感。他曾给一位经营中国花园的朋友写信说自己喜欢各式各样的中国园林，除了弯弯曲曲的桥梁。《中国诗文集》第二卷中收录两篇文章都是有关中国造园艺术的，第一篇是钱伯斯写的中国园林设计和布置，第二篇是耶稣会士王致诚对北京皇家园林的介绍，此为珀西的新译文，较之前斯潘塞（Joseph Spence）的译文更为充实。最后一篇是翻译了耶稣会士李明对皇太后六十寿诞庆典的描述。

四、结语

当时珀西会被中国的主题所吸引，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因为 18 世纪英国人十分喜爱中国的手工艺品与文学作品，对中国充满了虚幻缥缈的想象。在 18 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中，中式装饰风格在品味、审美和高档元素中占据很高的地位。英格兰越来越多地引进、模仿中国的商品与设计，并将中国与欧洲元素奇怪地融合，这种融合尤其体现在建筑风格中，甚至一度认为在民宅中布置以中国风格的装饰是彰显新财富的一种方式。

在 18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作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完全依靠二手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学者，珀西通过大量阅读有关中国的作品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国观，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尽管大量使用了耶稣会士发表在欧洲的很多材料，但珀西却没有贸然接受耶稣会士所描绘出来的那个如柏拉图理想国的中国形象。例如在翻译关于北京的皇家花园的文章时，原作者王致诚表达了对中国帝王的歌颂，“我渴盼能赶快回到欧洲，不过好在我还能用笔记录下这一切，将皇上的品德告诉其他传教士，颂之四海。”对此，珀西在注释中提醒英国的新教读者，“这是一个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并认为他们往往掩盖住自己的真实想法，美化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从很多论述中，我们能看出对于前人（主要是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叙述，珀西在译介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学者式对新事物的热切，他参与讨论中国主题的程度之深已经表明其对颇受当时欧洲主流思想界追捧的东方文明开始进行更为深层和冷峻的思考。

出版商社多兹利原本以为珀西的作品会迎合这种英国社会的“中国热”，但是《好速传》译本与《中国诗文集》中对中国文化的持续抨击，反而展示了珀西在有意对抗当时英国社会民众对他们知之甚少的异国情调的一种随波逐流式的颂扬。珀西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很少有像来华传教士那种对中国热烈的赞颂和夸张的褒扬，反而有令人不快的过度贬斥，比如前文提到的对中国语

言文字的评述方面。可以说，他意在反对当时英国社会所充斥着的中国风热潮，拒绝以各种方式将遥远中国理想化，间接地批判了中国式商品与设计（包括装饰风格中国热）在英格兰的流行。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事实上，18世纪反映在文学里的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恰好是当时生活现实的反面。非常具有悖论意义的是，对中国的仰慕在英国文学里似乎已经退潮，但在英国的社会生活里却方兴未艾。……这可能是‘文学是生活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取字面上的含义）的一共例证。18世纪的英国文学充满着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尤其是对当时流行的‘中国热’的抨击。文学似乎承担起了其所产生的社会氛围的纠错者，而不是社会氛围的反映。……这种热情减退（从17世纪的仰慕到18世纪的热情减退）并不能简单地用对中国认识逐渐增加来解释：这不是一个熟悉导致蔑视的问题。”¹⁸ 珀西对中国的研究恰好印证了钱先生的看法，他通过独特的方式去描写和评述中国及中国事物，试图抹去中国式文化产品迷人的异国色彩，从而揭示出作品中间接体现的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的真实原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早期英国汉学史上的人物和作品都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Ch'ênShou-Yi, "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 July, 1936.
2.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2.
3.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
4. 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
6. 叶向阳：《英国17、18世纪旅华游记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¹⁸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8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第9回年次大会(2017)

グローバル史観と東アジアの知識移動

グローバル史観(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とは、歴史研究及び歴史叙述の新たな視点、新たな方法であり、総体的な視野及び各々の結びつきという観念によって、マクロな世界史の編纂、あるいはミクロな個別事案の考察、または民族国家を超越した視野によって国を越えた歴史現象を捉えることである。

全世界が発展する総体性は、あらゆる社会に存在する普遍的な三つのプロセスの中に当てはめられる。それはつまり、人口の増加、技術の進歩及び伝播、異なる社会間で日々増加する交流である。東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における、知識の絶え間ない移動、様々な新技術や新観念、新信仰の相互交流、そしてある社会が別の社会と相互交流するための新たな手段や新たなパターンの模索、征服と被征服、融合と共生、移民や外来者との交流など、以前は覆い隠されていたこれらのテーマは、グローバル化という時代において、東アジアが自らの文化的価値を再認識するための新たな視座を提供している。

我々はグローバル史観をもって、東アジアの異文化間の相互交流に着目し、主に異文化間の相互影響の型式とその内容を詳細に解明する。特に相互関係を構築する過程を注視し、変化のメカニズムを提示する。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視座よ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識の移動と相互交流を理解することは、斬新な歴史構築の方式であり、相互交流の中であるからこそ、東アジア世界の変遷や知識の移動を真に理解す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である。

2017年の年次大会は北京外国語大学で開催する。本年次大会においては、グローバル史観から出発した文化交渉学の研究対象や方法、ディシプリンの超越、デジタル化の手段などについて再検討を行ない、東アジア各国の歴史を含む一國史を超越した視野を包括して、世界の変遷における相互交流理解による文化交渉学の構築を期待する。

大会の主旨は主として以下の三つの方法論を用いることで体现される。一、文化超境の視野：民族国家の枠組みを打破し、国家、地域、民族、文化、言語の超越による歴史現象を研究対象とする。二、相互交流：相互交流のネットワークにおける関係史を重点的に研究し、相互交流から東アジア及び世界各国の歴史を理解する。三、学問分野を超えた総合的な研究方法の運用：人類学・社会学・経済学・地理学ないし自然科学の方法論をも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の中に採り入れる。

本大会が北京外国語大学全球史研究院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る。我々は多くの学者の積極的なご参加ならびに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に新たな貢献をもたらすことを願う。

詳細について、学会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sciea.org>) にてご覧ください。